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历史轨迹^{*}

——“四个全面”形成与确立的历史脉络

□ 邱乘光

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和确立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布局，形成了“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四个全面”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战略意义。同时，“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及作为整体的“四个全面”，又都有其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过程，系统考察“四个全面”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脉络，无疑将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关键词：“四个全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历史脉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观点、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提出和确立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布局，形成了“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四个全面”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科学内涵，都具有重大

的战略意义。同时，“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及作为整体的“四个全面”，又都有其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过程，系统考察“四个全面”（包括其中的每一个“全面”）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脉络，对于深刻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应不无裨益。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由来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当人类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以后，中国却落伍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①为了实现中国梦，党的十八大确立了

^{*}本文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AHYZD2014-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邱乘光，男，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安徽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合肥 23005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是到2020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二是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这“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①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形成和确立是有一个逐步演进过程的。众所周知，“小康”这个概念，出自《礼记·礼运》，表达的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最先借用了“小康”的概念，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称之为“小康之家”、“小康的状态”、“小康的国家”。^②后来，他进一步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设想，把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而且使用了“小康社会”^③的概念。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当20世纪结束的时候，我国胜利实现了这一战略目标。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根据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④。据此，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⑤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在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

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内容包括：“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⑥

2012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⑦，首次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年11月，党的十八大对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进行了充实和完善，正式提出和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只有一字之改，却反映了我国发展阶段的新飞跃，它把全面小康社会的美好图景更具体更生动地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也把我们党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展现出来。不仅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还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5个方面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目标要求，特别是提出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⑧的“两个翻番”，使小康社会目标更明确、标准也更高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提出了一些新构想新要求。首先，他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其次，他强调“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⑨，“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⑩；第三，他强调全面建成小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238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9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

胡锦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人民日报》2012年7月24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4页。

⑨ 习近平：《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人民日报》2013年9月1日。

⑩ 习近平：《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5日。

康社会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①；第四，他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②，使之“成为引导人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③；第五，他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引者注），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④；等等。这就使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深刻了。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演进脉络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之一，将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

改革开放是与整个历史新时期相伴随的。从拉开改革开放序幕到全面深化改革，党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在不断深化。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已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1978年9月，他在“北方谈话”中就多次提到改革问题。同年10月，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深刻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

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⑥12月，他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警醒全党：“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⑦正是在此基础上，随后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讨论了改革开放问题，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正式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自那时起，改革开放就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和特色。诚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描述的那样：“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⑧

这期间，邓小平对改革开放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谋划。他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⑨；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⑩，实行改革“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⑪；强调“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⑫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⑬的著名论断，直接指导我们党和国家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与动力；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

习近平：《把群众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把党和政府温暖送到千家万户》，《人民日报》2012年12月31日。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习近平：《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5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习近平：《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2日。

⑬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36、150、236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⑨⑩⑪⑫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368、142、373页。

善和发展；强调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加广阔的通途；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次新的伟大革命，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强调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机制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强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①。具体包括“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②“在前进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③

正是基于这样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牢牢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致力于精心谋划和积极推进全面改革开放大业。既认真总结了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又围绕如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进一步理清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顶层设计，研究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这个总体方案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目标、新愿景、新蓝图，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

三、“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理路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即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实行这一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④。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系统部署。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之一，将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并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5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日。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4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08页。

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及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但令人非常遗憾和痛心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刚刚起步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①从而重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指引下，现行宪法及一大批基本法律陆续出台。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同时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部法律，拉开了新时期中国大规模立法工作的序幕。1982年，适应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和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保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中国先后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对宪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同时制定了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和进步的一大批基本法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并将其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同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②的重大任务。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将“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③等纳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④。2011年3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堂宣布：“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⑤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进一步确认“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⑥同时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⑦作为“新的要求”纳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此为主题，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而且科学确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根本原则、重大任务和具体部署，精心绘就了法治中国蓝图，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指明了目标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3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11年3月19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14页。

从“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表述来看，据公开文献资料，2014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首次使用“全面依法治国”^①的表述，这也可视为对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表述的简化。此后，一直是两种表述并用。但在用于表述“四个全面”具体内容时，除2014年12月14日在江苏考察调研时的讲话，即首次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②时使用的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外，其余使用的都是“全面依法治国”。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发展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明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之一，将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从长期执政党建设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原则。早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即根据执政后党的建设的实际，从加强思想教育、健全制度、加强监督等方面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想。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制定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颁布了新党章，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④的

方针，并先后在全党集中开展了整党、“三讲”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持续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建设。1983年10月，他曾针对当时党的状况说：“党内还存在着不少没有来得及清理和解决的严重问题。这里有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消极东西，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消极东西。……所有这些，都是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⑤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⑥因此，他在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作的政治交代中强调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⑦就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还在提醒：“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⑧所有这些，无不是在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自觉遵从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1989年12月，江泽民同志即明确提出：要“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发动和依靠全党的力量来抓紧党的建设的工作，在各方面从严治党，为全面提高党的战斗力而斗争”^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首次把“从严治党”的方针写进了党章。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⑩。2000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为题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从严治党”方针。2001

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月1日。

习近平：《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5日。

习近平：《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人民日报》2014年7月1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7、300、314、380-381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4页。

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0页。

年，他又在“7·1”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从严治党，必须全面贯彻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切实体现到对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各个环节中去。”^①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②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着眼于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对加强党的建设作出了总体部署。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特别是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③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需要，以及新形势下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确定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新布局，要求全党“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④。

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是要使党始终成为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⑤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上任伊始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在谈到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时就明确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自觉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全面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坚持全面的观点，把握事物的全面性，是正确认识事物和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提出的“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是“全面”的；与之相适应，“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也都是“全面”的；因此，“从严治党”也同样应该是“全面”的。在前三个“全面”相继提出之后，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⑦并作出了具体部署（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要求）。同年12月14日，他在江苏考察调研时的讲话进一步使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表述，并且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⑧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既契合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对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迫切要求，也体现了党在面临长期复杂严峻的“四大考验”，面临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的“四大危险”的高度清醒和自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145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9、349-350、70页。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习近平：《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5日。

五、“四个全面”整体表述的定型定位

前面已经回顾和考察了“四个全面”中每一个“全面”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过程。通过上述考察发现,如果不要求“四个全面”中每一个“全面”的具体表述都与定型化以后的表述完全相同的话,可以看到作为整体的“四个全面”的形成和定型经历了先从“一个全面”到“三个全面”、再从“三个全面”到“四个全面”的过程。其中“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于其具体内容的演变,如果追溯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早是提出于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如果就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讲,则最早提出于2012年胡锦涛同志“7·23”讲话、确立于同年11月党的十八大。

“三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实际形成和确立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从党的十八大文献中,我们虽然找不到“三个全面”的概念和表述,但确实集中了“三个全面”的具体内容。有种观点认为,党的十八大只形成了“两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到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才把“两个全面”进一步扩展为“三个全面”^①。其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不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的,而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②至于明确提出“三个全面”的概念和表述,那则是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他在谈到全会决定起草的情况时说:“全会决定起草突出了5个方面的考虑。”首要的一点就是“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工作部署,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③。

“四个全面”中的最后一个“全面”即“全面从严治党”最早见于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当时提出的是“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但没有与其他“三个全面”并提,更没有明确提出“四个全面”的概念和表述。同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的讲话中,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④。这里不仅首次使用了“全面从严治党”(可以理解为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简化)的表述,而且将其与此前已经提出的“三个全面”并提。此时虽然仍未明确提出“四个全面”的概念和表述,但“四个全面”的内容已经正式形成。所以,不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公认“四个全面”是在江苏考察调研时的讲话中最早正式提出的。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和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并于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使用了“四个全面”^⑤的概念,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概括和表述为“四个全面”,从而标志着“四个全面”表述的定型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首次正式提出“四个全面”以后的3个多月里,又对“四个全面”作了多次强调和阐述,中央的其他主要领导同志也都有这方面的阐述,其中有些论述直接涉及定位问题,这应该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定位最重要的根据。首先,“四个全面”就是我们正致力于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2015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的讲话中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⑥。毫无疑问,这个“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和“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就是我们党正在奋力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其次,“四个全面”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施芝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怎样形成的》,《北京日报》2015年3月2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习近平:《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5日。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日报》2015年2月3日。

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四个全面”学习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事业发展的“总抓手”或“牛鼻子”。2015年1月19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各项工作”^①。同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在谈到这四个“全面”时又指出：“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②这表明，“四个全面”又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总抓手，引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牛鼻子”。

第三，“四个全面”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布局。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③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这当然是战略布局。由于这个战略布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的，那自然就应该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布局。

第四，“四个全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理政方略和重要保障。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成员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两年多来，我们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逐步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方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治”之“国”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国”，所“理”之“政”也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之“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也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目标。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治国理政方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也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理政方略”和“重要保障”。

最后，“四个全面”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虽然没有直接谈到这一点，但不难理解，一个重大战略布局的形成离不开战略思想的指导，一个重大战略布局本身也会体现着指导它形成的战略思想。另外，2015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同志在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开辟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⑤同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⑥。“四个全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当然也是一个重大战略思想。这个重大战略思想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

责任编辑：凌雁

习近平：《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1月22日。

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日报》2015年2月3日。

习近平：《中国愿为世界发展提供更多中国机遇》，《人民日报》2015年3月30日。

张德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理论指导实践指南》，《人民日报》2015年3月6日。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4月29日。